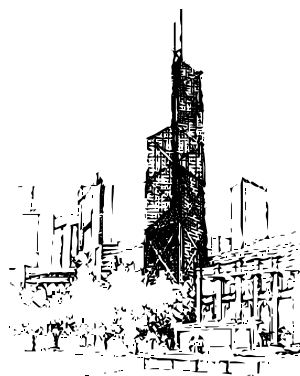




香港是一座小城市，同時也是一座大城市。她獨特的歷史背景，促使她成為一個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匯點。毋庸置疑，她可以說是近代世界史上一個極不平凡的地方。

香港可被視為中國一座得天獨厚的城市，住在其中的市民也得天獨厚，他們在香港的成功路上分別作出了不同的貢獻。可惜我自己卻未能在香港的成功故事中盡一分力，因為我於 1980 年，即香港踏入黃金時代之前，便離開了這座城市。不過，即使我只是一名旁觀者，但也希望能夠分享到香港成功的喜悅，以及感受到其中的驕傲和滿足。儘管香港人經歷了不少動盪，特別是二次大戰後的艱苦歲月，可是他們仍然取得多項成就，實在令人佩服。

香港在殖民主義歷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她早於 1842 年成為英國殖民地。不過，與其他多個大英帝國殖民地在二次大戰後獲英國准予獨立不一樣，香港要在經過 150 多年與中國分離後，才得以回歸祖國。

香港是一座受歡迎的繁華都市，人們在這裏可以體驗到東西方文化交流所綻放出的獨有異彩。相信差不多所有於過去 50 年間曾經到訪過香港的旅客，都會認同這個說法，這也說明了為何香港至今仍然能夠保持作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熱門的旅遊勝地。

2018 年，共有 6,500 萬名旅客訪港，其中來自中國內地的遊客達 5,100 萬名，數字驚人。香港向來是內地遊客的旅遊度假熱點，主要原因是她是一個購物天堂，又是一座現代化的先進城市。此外，我相信在內地遊客的心底深處，可能都有一種莫名的渴求和好奇，想看看這個於大約兩個世紀前割讓給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演變成甚麼樣子。畢竟這個殖民地有超過九成居民是中國人，他們可能衣著不同，說話不同，卻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

大多數訪港遊客都屬短途旅客，主要來觀光兼購物。香港佔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是有意前往亞洲各地或中國內地旅遊的人們一個理想的中轉站，因此一直以來都是亞洲旅遊行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選擇。

香港的獨特背景，正好為她編寫了一個多姿多彩的故事。我相信當年在大英帝國權力達到巔峰之時，即使該國海軍艦隊中最有遠見的軍官，也無法想像得到當時這個僅被英國意圖用作貿易中轉站

的荒蕪小島，會發展成為今天的香港。

香港於二次大戰後開始蛻變。當時英國在世界各地，由東南亞以至西印度群島，擁有多個殖民地，其中以香港最為出眾。一直以來，英國人都視印度為該國皇冠上的瑰寶，印度不但面積廣大，而且人口眾多，所以往往被認為是大英帝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殖民統治區域。不過我可以大膽地說，香港是英國皇冠上的第二塊瑰寶，事實上，二次大戰後，香港是大英帝國餘下的唯一一塊瑰寶。

香港由英國殖民地到 1997 年回歸中國的這個轉變，是現代歷史上一宗前所未有的政治事件，就是一個殖民強權國家將殖民地交還給其祖國，而非讓她獨立，其中過程當然經過中英雙方進行了多輪的磋商。

我個人認為，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香港可以由二戰後的 1945 年起，於短短七十多年間，飛躍發展成為一座在國際上地位舉足輕重的城市，環顧全球，實在沒有其他城市可以與其相比。

香港多元文化薈萃，推動著這座城市不斷前進，也為她增添豐富色彩，當中包括本土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以及流行文化等等。今時今日，當我們在世界各地光顧餐館時，都會看到“fusion”這個詞，意思是指餐牌上的菜式匯聚了各個國家和文化的美食，供顧客品嚐。鑑於香港匯聚了眾多不同的文化，由此看來，在 fusion 這個詞盛行之前，香港便已經是一個 fusion 城市。

於 1960 年代初期，不少人以「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這個概念形容香港，意思當然是指 1842 年隨著清廷在鴉片戰爭被英國皇

家海軍打敗後，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予英國為殖民地的史實。在此必須指出，雖然傳統上一般以為整個香港是於 1842 年割讓給英國為殖民地，可是當時其實僅指面積只有 80 平方公里的香港島。中國其後於 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才根據中英《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及按照 1898 年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 99 年期租約將九龍半島以北的新界租借給英國。港英政府亦因而把分隔九龍與新界的界線命名為界限街。

正因為香港由香港島、九龍半島以及租借而來的新界組成，所以許多評論員和歷史學者便構思了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這個概念。

今天我們一般人口中所說的香港，包括了整個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總面積約一千多平方公里，其中單單新界便佔多達 953 平方公里。雖然這三個組成部分先後割讓或租借給英國，但實際上，自 1898 年以來這些地區一概被統稱為香港，而英國殖民政府也一直把三者作為一個整體統一管治。

自清廷割讓香港給大英帝國之後的 150 年間，英國政府一直從倫敦委派各任總督到來治理香港，惟二次大戰時日本於 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例外。

1997 年 7 月 1 日，在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正式回歸祖國。自此，香港總督的位置便由一名獲北京中央政府認可，並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取代，負責管治香港。



過去 150 多年來，香港這座繁榮富庶的大都市所走過的路並非一帆風順，只不過每次遇到挑戰時，總能克服困難，再次起來重新上路，甚至比從前更強大。香港面對的挑戰包括：二次大戰時被日軍佔領三年零八個月；1956 及 1967 年先後發生「暴動」；1982 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時所引起的動盪不安；1997 至 199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後群（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沙士」疫情；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2014 年雨傘運動；2019 年反修例運動；以及 2020 年初爆發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COVID-19 pandemic）。

上述危機的性質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及公共衛生，其中一些更屬死灰復燃。每場危機都對香港人造成極大打擊，尤其是窮苦大眾，而年輕人則感到前途黯淡，這些動亂更觸發人才外流的移民潮，不少教育程度高的專才紛紛遷移到外國重建新生活。可幸的是，儘管香港遇到這些種種困難，但每次都能安然渡過。過去 40 年來，香港經濟只出現三次負增長，分別是 1997 至 199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3 年的「沙士」危機，以及 2019 至 2020 年的反修例抗爭運動和新冠病毒疫情。

香港人在經歷過每次危機後都變得更聰明和更堅強，可謂十分難得。隨著香港日益富裕，她逐漸演變為一個外向型的開放社會，香港人也變得更善良、溫和及文明。有關香港人的這些重要特質，我會在隨後幾章提及香港的慈善工作時作進一步闡述。由於香港是一個經濟貿易對外開放的免稅港，她的外向打造了一座先進文明

的城市，人民平和踏實，社會和諧，世界上沒有多少地方可以與她看齊。

當然，香港並非沒有弊病。雖然香港的個人平均淨資產高踞全球前列，根據亞洲財經雜誌《財資》（*The Asset*）報道，2019 年香港成年人的平均財富估計高達 489,260 美元（相比之下，全球的平均數字只為 70,850 美元），可是香港的堅尼系數卻達 0.54，顯示大部分財富集中在一少撮人手上，造成收入高度不均。事實上，過去 40 年來，香港的堅尼系數一直持續上升，表示財富不均的情況日趨嚴重。因此，香港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也是自由經濟學家對香港的主要批評，就是縱使她是一座富裕城市，但跟其他富裕程度接近的西方國家或地區比較，本地的貧富懸殊情況較為嚴重。社會上仍然有許多貧窮人士未能共享財富，而這種情況又直接造成另一個問題，就是地產物業價格和租金居高不下，以致越來越少人能夠買得起自置物業。此外還有一個好比計時炸彈般的問題，便是人口迅速老化，目前香港不論男女的人均壽命均名列世界首位。

以上簡單地介紹了香港短暫的歷史，同時概述了她的成就、挑戰以及缺失。基於我與香港的關係，我也想在這裏簡單向讀者介紹一下自己。

到目前為止，我的一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我在香港成長至完成大學教育的日子，歷時大約 24 年。其次是我在英國度過 32 年，並成為一名血液專科醫生的日子，在這段期間我每年都會回港最少一次，探望我媽媽、哥哥、姐姐和家人。第三階段是我於過



去九年在位於深圳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工作的生涯。雖然我在 2019 年達到 65 歲的退休年齡，但仍然以半退休身分繼續行醫，這年我撰寫了第一本書，該書於 2020 年出版，內容主要講述我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工作的經驗和所見所聞。到 2020 年 1 月初，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改變了整個世界，我於同年 5 月寫了第二本書，分享身在深圳期間應付新冠肺炎的經驗。

差不多整個 2020 年，世界各地都全力以赴對抗新冠疫情，其中一個普及全球的防疫建議，是勸喻人們保持社交距離，儘量留在家中。在疫苗面世之前，這的確是一個保護公眾以及保護自己免受感染的最有效方法。對於我來說，半退休狀態加上保持社交距離，讓我有更多時間去思考、學習，以及做一些以前應該做但沒有時間做的事情。

我於 2020 年 7 月開始構思撰寫這書，我知道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甚至具爭議性的任務，有些人更會認為在此時此刻寫一本關於香港的書，可謂不合時宜。目前在新冠病毒肆虐下，整個世界紛紛攘攘，各地政府均竭力對抗疫情，掙扎求存，人們亦感到氣餒、無望。與此同時，國際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又就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各方面的分歧上表現得劍拔弩張，情況令人憂慮。當時這個 7 月份，香港不但遭受新一波新冠病毒疫情打擊，同時更面對中國當局於 2020 年 5 月訂立並迅速於 7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國家安全法》，社會瀰漫著一片不安情緒。

沒有人知道這些張力和問題將會如何發展。雖然 2020 年底已

有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推出可供人們接種，但香港前路依然黯淡不明，一些人甚至深感憂慮。在香港的新聞和社交媒體，移民再次成為熱門話題。我自己早於 1980 年移居英國，深深知道移民是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卻十分艱難的一回事。移民可以說是將一些未知之數轉換成另一些未知之數，移民者不但要面對許多預料中的未知，更有甚者，還要面對許多不可預料中的未知。我們都希望能夠遷移到一個生活更美好的地方，可是當我們深入探索時，便不免懷疑這個所謂更美好的地方究竟在哪裏，更莫說怎樣才可以到達了。

雖然我已離開香港一段頗長時間，但過去數十年來，我一直密切關注香港發生的事情，對這個我成長的地方完全沒有疏離的感覺。即使目前我的家在英國，可是在香港我仍然有我九十多歲的母親、哥哥、姐姐、親人和同學。

我由 2012 年起在中國內地工作，並開始每星期在深圳與香港之間穿梭往來。深圳到香港只有大約 35 分鐘的火車車程，兩地的距離跟利物浦與曼徹斯特之間的距離差不多。在深圳工作的這段期間，我獲得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去認識中國多一點，以及了解到香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認知重新挑起了我內心對香港的那份親切感，同時亦產生了一種在內地生活（特別是在深圳生活）的新感覺。

2020 年夏天我身處英國，由於新冠疫情的關係，香港和中國內地均實施強制檢疫措施，從英國入境香港的人必須隔離 14 天，由香港進入中國境內亦須隔離 14 天，因此我暫時不能返回內地繼續醫院



的工作。在這段因為疫情而被迫保持社交距離的日子，我開始認真地問自己幾個問題：面對極不明朗的未來，很多香港人發覺自己正處於人生交叉點上，最低限度，我是否應該嘗試深入回顧一下香港過去數十年所經歷的一切，看看有沒有出路呢？換言之，香港的過去能否為其將來提供一些指引呢？我深信可以的，因為歷史往往能夠為我們指引前路。此外，我自己的過去和經歷能否為別人提供一點亮光，幫助他們減少憂慮去面對未來呢？還有，我自三歲起便在香港長大，在這裏度過了人生首四分一的歲月，那麼對於這座我又愛又欣賞的城市，有沒有一些關於她的事物我可以記錄下來呢？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又可以如何儘量跟讀者分享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呢？

當我細心思索、考量我有沒有足夠資格撰寫這樣一本書的時候，我開始深入探索我的記憶，同時亦做了一些資料搜集的工作。我發覺坊間不乏講述有關香港的英文書籍，包括一些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其中部分我也讀過）、旅遊指南、描述有關中英雙方就香港主權問題進行談判時香港景況的非小說類作品，還有少數記載至2010年代初為止的香港歷史文獻。

許多較近期出版的書籍，特別是英語刊物，都主要論述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政治形勢和其帶來的影響。但奇怪的是，用敘述手法撰寫由二次大戰後直至2020年這段期間，香港在社會、經濟及文化方面的成與敗、得與失的著作，卻似乎寥寥可數。換言之，沒有多少書籍述說關於我這個年紀的戰後嬰兒潮一代在香港發展中

扮演的角色（由於我有一段長時間不在香港，這代香港人並不包括我在內）。雖然市面上的確有數冊這類書籍，而且都相當具有學術價值，可惜最新一冊的出版日期已是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歸中國的那一年。此後即使也有一些書籍出版，可是都主要論述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和管治，或是有關先後於2014及2019年發生的兩場大型社會運動。

市面上有關香港由1950年代到2021年這段時期的敘述性書籍屈指可數，是推動我執筆撰寫本書的主要原因。

此外，我認為部分已出版面世的書籍所持的立場太過負面，甚至對香港的批判過於嚴厲，忽略了過去數十年來香港取得的成就，尤其是香港人如何同心協力為這座城市爭取成績，以及共享成功果實。故此，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香港人述說他們的故事，特別是由我這位在香港成功故事中沒有半點貢獻的人來執筆，立場應該較為客觀。同時，至目前為止，市面上並沒有任何書籍論述香港在全球背景下（例如自由市場主導的經濟環境、現代中國的崛起、多個亞洲經濟體在世界成功興起等）所發生的大事，更遑論論述有關香港自1997年起由一個英國殖民地過渡至中國特別行政區這個歷程中所展現的勇氣、創意和經濟實力。

我很難向讀者解釋為甚麼我能夠鼓起勇氣執筆寫這本書，究竟它可以達到甚麼目的呢？我並不是一名專業作家，甚至連業餘作家也稱不上，也不是政治評論員或社會學家，更不是歷史學家。事實上，有些人可能認為我根本未能作出甚麼有價值的貢獻，他們或者



說得沒錯。我唯一可以說的，就是這些年來，我雖然身在英國，但我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情況一直十分關心。我跟許多香港人一樣，在這裏看見及經歷過不少事情，對這座城市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回顧過去多年來香港發生的一切，我實在希望與讀者分享我的感受，或許可以透過這本書，講一個有意思的香港故事。

因此，我期望我這些有關香港的個人回憶，可以描繪一幅圖畫，讓讀者能夠清晰地從一個半主觀的角度閱讀甚至轉述這個香港故事。換言之，這書是我樂意與讀者分享關於我在香港生活的短短回憶錄，我誠心希望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以更加認識和欣賞這座面積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她不單是當年那個英國殖民地，同時也是今天中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當我開始落筆寫這書時，英國的新冠肺炎第一波疫情正漸漸減退，當地經過首次全國封城後已逐步開放，不過政府仍然極力勸喻人們保持社交距離和自我隔離，以防疫情再次爆發。在 2021 年初，「新常態」（New Normal）這個於 2020 年夏天開始在全球流行的用語，已經成為了人們日常的生活方式，也是保護自己免受新一輪新冠病毒感染的一項重要措施。

保持社交距離和留在家中這些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新常態」，讓我有機會書寫一個值得述說的故事。不過，我在寫作方面畢竟只是一名帶著點理想主義的新手，即使我滿腔熱情，但執筆時也難免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

我抱著小心翼翼的態度訴說這個香港故事，因為在現時爭論紛

紛的環境下，我不想它變成一個引起政治爭端的火頭，挑動人們辯論香港今天面對的種種對與錯問題。現時香港發生的一切，令我深感痛心，也因此對香港和她在過去數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產生更深切的懷舊之情。這書是我追憶往昔之旅，但願讀者可以與我同行，並一致期望目前香港社會的分歧可以得到和解，創傷得到治療，大家共同迎接新的明天。

回望過去能讓人窺視未來，希望藉此可以振奮香港人心，重燃香港精神，也就是香港人以靈活變通、積極進取見稱的精神。本書的內容亦以此為重點。

知識和觀點必須與人真誠分享才最有意義。因此，我希望這本非學術性的書，能夠為撰寫學術文章、講述香港事跡的歷史學者和社會時事評論員提供一點資料，假若他們認為我的個人看法值得參考的話，也許書內的小城故事和軼事可以幫助他們領會到我們的香港精神。

本書所寫的香港人，是推使這座城市取得出色成就的動力。他們是香港成功故事台前幕後的監製、編劇、導演和演員，整份劇本由他們自己編寫，因此所有成績也全部歸功於他們。我希望這些以勤勞和堅強著稱的香港人，可以克服一切困難，推動香港在今後的日子再創新高。從多方面來說，我就好像一名毫無經驗的電影評論員，當看完一齣獲獎電影要寫影評時，雖然滿腔熱情，但卻感到力有不逮。我相信一些讀者可能認為此書的內容有點過於感性和主觀，對此我也不否認。事實上，在某些情形之下，感性並無不妥，



因為感性可以讓事物變得更有人情味，而不是冷漠的理性分析，假若缺乏感情，述說一個成功故事只會像在電腦表格列出刻板的數據一般。

當然我必須承認，有些範疇我並未有觸及，而書評家亦可能會說感性導致我對某些議題未能作出客觀剖析。不過，我在處理不同議題時，已嘗試盡量保持一定程度的客觀，務求在我對香港的深厚感情與作者必須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之間取得平衡。

鑑於以上種種原因，我決定以 1957 年時年三歲的我跟隨父母來到香港的時間作為書的開首，同時按著時間順序鋪排內容，根據我的記憶反映我的成長歲月。讀者毋須同意我所講的事物，這並不是本書的目的，但只要有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夠產生一點共鳴，我便已經感到十分欣慰了。

本書無意涉及政治，我也希望能夠做到如此。當我於 2021 年 3 月完成初稿時，世界各地正陷入一片紛亂，人們就全球的政治局勢進行激烈爭論，各種沒有事實根據的陰謀論鋪天蓋地，這些爭辯不但在新聞及社交媒體不脛而走，甚至不少有關這些議題的書籍相繼出版。不過，我可以向讀者保證，本書不談政治，因為我知道，若要論述目前全球政治舞台上所發生的一切是甚麼、為何發生、如何發生等等，當中所需要的智慧和敏銳觸覺，我都一一欠奉。

撰寫本書的最後一個原因，是我希望透過與讀者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和我眼中的香港故事，能讓讀者感受到我以香港為傲的心態，同時期盼藉此可以激勵讀者同樣能以香港為傲。

